
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与模式

刘润^{1, 2} 任晓蕾³ 黄敏¹ 钟晟⁴ 吴姣¹¹

(1.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62;

2. 湖北大学 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62;

3. 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1;

4.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文化产业集聚是地理学 and 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领域, 尤其城市尺度的文化产业集聚近年来备受学者关注。以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的武汉市为例, 基于天眼查企业数据库获取文化及相关企业数据, 采用地理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揭示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与模式, 研究发现: ①武汉市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三环内中心城区; ②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心城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 ③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不同区域的优势度有差异; ④吊销、注销的文化企业可从反面透视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⑤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在交通依赖、区位选择、产业关联、载体依托和主体推动等方面已形成一定的模式。基于此, 根据武汉市文化产业总体集聚发展态势、吊销和注销文化企业的空间特征和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提出具体优化、提升集聚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文化产业 集聚发展 载体依托 艺术村 艺术区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0) 12-0128 - 09

1970 年代后, 西方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在全球化及新经济的冲击下逐渐式微, 以博物馆、美术馆、商业文化区、文化旅游景区、文化创意产业园等为载体的文化产业日渐被纳入到城市发展政策与规划中^[1-2], 肩负起改善后工业时代城市遗留问题和提升城市国际、区域形象与竞争力的重要职责。我国自 1990 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文化经济迅速崛起, 至 2018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3.9 万亿元, 占 GDP 的 4.3%,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构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这使得文化产业集聚备受诸多学者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尺度。①国家尺度上,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文化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局部集中、整体分散”的点状集聚状态, 东部沿海省市集聚程度最高, 在行业上按照集聚程度将文化产业划分为高度集聚型(如录像制品发行、艺术表演团体、录音制品发行)、中度集聚型(如文化艺术研究机构和文化市场经营机构)和低度集聚型(如广告业、博物馆、群众文化业、休闲娱乐服务)^[3-8]。②区域尺度上, 对长江经济带、民族地区、皖江城市带、湖南、广西、河南、江苏、山西等地区和省域的文化产业集聚进行了系统研究, 重点揭示了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特征^[9-16]。③城市尺度上, 主要集中

基金项目: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19012); 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2018(C)003)

作者简介: 刘润 (1987-), 男, 安徽肥西人, 博士, 讲师, 硕士生导师, 注册城乡规划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
E-mail: liur@hubu.edu.cn.

于北京、上海、西安、苏州、成都、济南等大城市，核心内容仍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空间特征，如殷小茵利用 POI 数据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研究^[17]，栾峰从企业选址角度分析了上海中心城区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18]，薛东前基于 Ks、T 指数、Q 指数和城市功能格局研究了西安市文化产业的集聚和分布^[19-21]，杨瑾基于文化企业数据研究了苏州古城文化产业集聚的行业特征、空间特征、区位特征^[22]，邱高会、于杰从定性角度分别研究了成都市和济南市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23-24]；此外，也有少量学者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模式、空间效应、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25-27]。

总体而言，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研究多利用面板统计数据，采用区位熵指数(LQ)、赫芬达尔指数(HHI)、空间基尼系数(Gini)、集中度指数(CRn)等指标测度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而城市尺度上的研究，由于面板统计数据相对缺失，致使这些指标难以运用，目前主要运用企业数据、POI 数据，其中企业数据多来源于工商、文旅等政府部门或城市黄页，但要想获取比较完整系统的数据难度相对较大，POI 数据一般只包含企业名称、位置和行业等信息，且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清洗方可保障数据质量。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利用天眼查大型企业数据库对文化产业集聚发展进行探索，其企业数据包含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状态、地址信息、产业类型等多个属性，能够较好地揭示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状态。基于此，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利用地理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化、企业类型、产业类型、吊销和注销企业等多个维度解析文化产业集聚的特征，同时系统归纳总结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进而为优化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指导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定政策启示。另外，武汉市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其传统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正面临升级和调整，研究其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对于加速城市转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数据

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的直接载体，借助文化企业更能清晰地揭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与模式。本研究的文化企业数据来自于天眼查企业数据库。天眼查是由柳超博士领衔开发的商业安全工具，拥有 1.8 亿家企业信息，包含上市信息、企业背景、企业发展、司法风险、经营风险、经营状况、知识产权等 300 多种数据维度^[28]。参考《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在机构类型中选择“企业”，在行业分类中选择“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进行搜索（表 1），在企业状态中选择“存续”①，进行批量下载，对获取数据进行清理，共得到 11577 条有效数据（数据查询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另外，部分企业注册成立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注销或吊销，为强化对文化产业集聚的整体认识，指导未来发展，在企业状态中再选择“吊销”和“注销”，对此类文化企业进行单独分析，共获取 6154 条有效数据。最终，借助 Geocoding 工具将企业数据转变为具有坐标和属性信息的点数据。

表 1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产业大类	产业小类	产业大类	产业小类
娱乐业	室内娱乐活动	文化艺术业	文艺创作与表演
	游乐园		艺术表演场馆
	彩票活动		图书馆与档案馆
	文化/娱乐/体育经纪		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理		遗产保护
新闻出版业	其他娱乐业		博物馆
	新闻业		烈士陵园/纪念馆
	出版业		群众文化活动
广播、电视、电	广播		其他文化艺术业
	电视		体育组织
影和影视录音	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	体育	体育场馆

制作业(简称 “广电业”)	电影和影视节目发行 电影放映 录音制作	休闲健身活动 其他体育
------------------	---------------------------	----------------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是点模式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使用核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算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在 ArcGIS 的二维地理空间中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核密度越高，表示点要素分布越密集，反之则越稀疏，用于直观地呈现要素周围的密度变化^[29]，其一般形式为：

$$f_n(X) = \frac{1}{nh^d}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

式中：k () 为核密度方程；(X-X) i 为估值点 X 到要素 X_i 的距离；h 为带宽即搜索半径；n 为要素总数；d 为数据维数。

1.2.2 创建渔网与格网分析

创建渔网 (fishnet) 即在研究区的范围内生成一个规则的格网，使其覆盖整个研究区域。由于武汉市各市辖区、街道的面积差异较大，以其为分析尺度，不能很好地揭示文化产业的集聚特征，如集聚发展形态、结构构成等，因此，需通过创建渔网划定更小的空间统计单元。最终，在武汉市行政区生成 2km×2km 的格网，得到 2360 个格网，文化及相关企业分布在其中 442 个格网中 (即有效格网)。创建渔网后，计算每个有效格网中某类文化企业占格网所有类型企业的比值 Z (简称“格网占比”)，可用公式表示：

$$Z = X_i / X \quad (2)$$

式中：X_i 为 i 类文化企业数量；X 为每个格网所有类型文化企业数。

1.2.3 OD 分析

OD 分析原为交通起止点调查，用于研究大规模移动数据 (如交通数据、移动电话数据) 的动态规律以及移动行为^[30-31]。本研究借其探究武汉市不同类型文化产业之间的空间分布关系，一般 OD 线越密集的地方，两者的聚集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不考虑 OD 线的流量问题。为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将 500m (合理的步行距离) 作为企业集聚的最大距离。

1.3 研究区域

武汉市是中国工业的发源地、全国重要工业基地，1990 年代以来，随着武汉城市竞争力的不断降低，经济转型逐渐被提上日程，而文化产业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武汉市历史、文化与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2000 年后武汉市高度支持文化产业项目，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

及旅游资源，培育和引入各类文化产业项目，并相继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计划（2012—2016年）》《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12）《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2012—2015年）》《关于推进文化科技创新、加快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意见》（2014）《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实施方案》（2015）《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2017）《关于加快武汉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19）等一系列政策措施。2016年武汉被列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深入推进“读书之城、博物馆之城、艺术之城、设计创意之城、大学之城”建设，深度挖掘楚文化、三国文化、近代工商都市文化、水文化等内涵，推进“汉派”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2012—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3.5%增加到2017年的4.6%。2017年武汉还入选“设计之都”，成为继深圳、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第四个“设计之都”。此外，由于本研究覆盖武汉全域，范围较大，将武汉市划分为中心城区和远城区以便于比较分析，其中，中心城区主要包含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青山区，远城区主要包含蔡甸区、东西湖区、汉南区、黄陂区、江夏区、新洲区。

2 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特征

2.1 总体集聚发展格局

截至2019年7月，武汉市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三环内中心城区，尤其江岸—江汉—硚口沿（长）江区域、武昌黄鹤楼片区至中南路—中北路片区、洪山区街道口片区、青山区和平公园片区等都是文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区域，因为中心城区具有优良的市场环境、交通环境、投融资环境、服务环境、企业协作环境等。时间尺度上，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经历了由内向外扩散且中心城区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2010年前武汉市文化企业主要集中于江岸、江汉和硚口等长江以北的少数几个市辖区，其后逐渐转向武昌、青山、洪山和汉阳等区，目前正向东西湖区、江夏区等远城地区扩散（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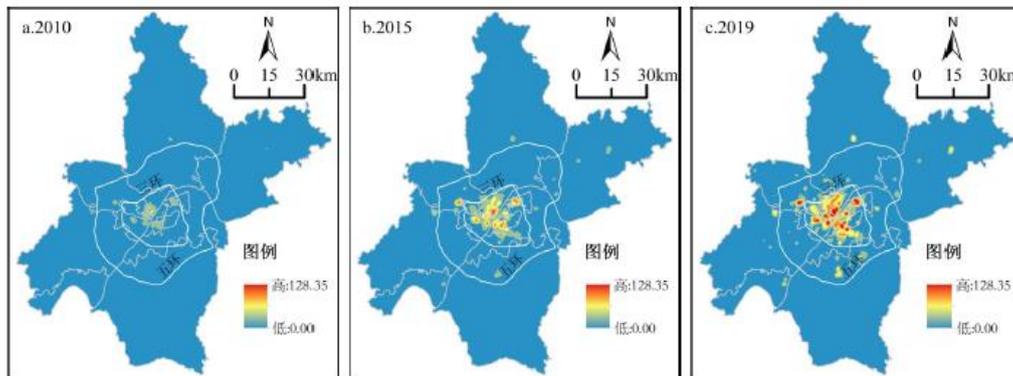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产业总体集聚及其演化

2.2 基于企业分类的集聚发展

文化及其相关企业在类型上可分为个人独资、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其他属性4种企业类型。以每个有效格网为单元，计算每类企业占比，以此探究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个体工商户5766家（占据总数的近50.0%），远城区格网占比普遍较高，多高于60.0%，是远城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中心城区格网占比相对较低，表明中心城区由于文化企业类型更加多样，个体工商户的优势度不如远城区凸显。有限责任公司5291家（占据总数的45.7%），中心城区格网占比普遍高于37.7%，且在武昌、洪山、青山等区更为集中，表明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心城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438家（占据总数的3.8%），占比较高的格网零散分布在三环外的部分区域，尤其东西湖区和江夏区，说明三环外个人独资具有相对优势（图2）。其他属性企业包括普通合伙、股份有限、有限合伙等，共82家（占据总数的0.7%），其中江夏区占19

家，表明江夏区文化产业发展主体总体上更为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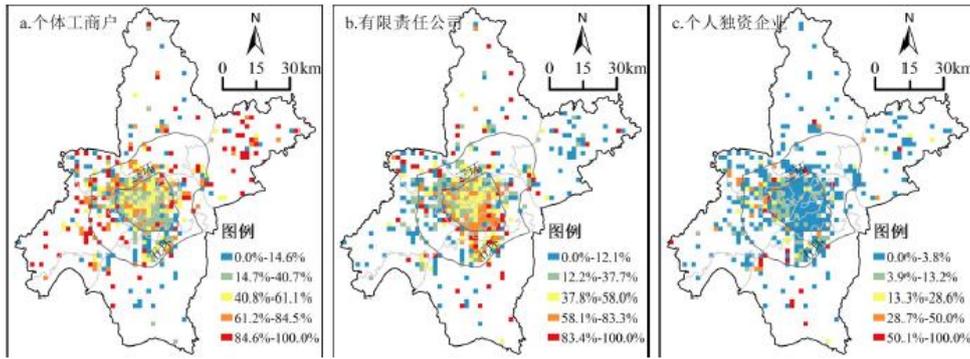


图2 基于企业类型主要文化企业的格网占比

2.3 基于产业分类的集聚发展

根据文化及相关企业所从事的产业类型划分，主要有文化艺术业、娱乐业、体育业、广电业、新闻出版业 5 种类型。文化艺术业 3719 家（占总数的 32.1%），二环内的格网占比普遍在 30.0%~47.0%之间，二环至三环间普遍在 10.0%~30.0%之间，三环外仅江夏区北部有成片较高占比的格网，此种分布特征说明文化艺术业主要集中于三环内。娱乐业 5262 家（占总数的 45.5%），总体上距离市中心越远，格网占比越高，反之则越低，其中一环内格网占比最低，在 15.5%~38.3%之间，这主要因为娱乐业门槛相对较低，是远城区文化产业的重要类型，具有相对优势，致使很多格网的占比很高，而在中心城区，娱乐业的重要性并没有远城区凸显，加上中心城区对文化产业要求更高，因此娱乐业在中心城区的格网占比普遍较低。体育类企业 2088 家（占总数的 18.0%），三环内的格网占比多在 7.8%~23.0%，而其中洪山区、武昌区、青山区部分区域更高达 23.1%~40.9%，可见，文化体育、休闲健身正逐渐成为这些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三环外多数格网占比比较低（图 3）。广电类企业 436 家（占总数的 3.8%）、新闻出版类企业 72 家（占总数的 0.6%）主要聚集于三环内，向心性发展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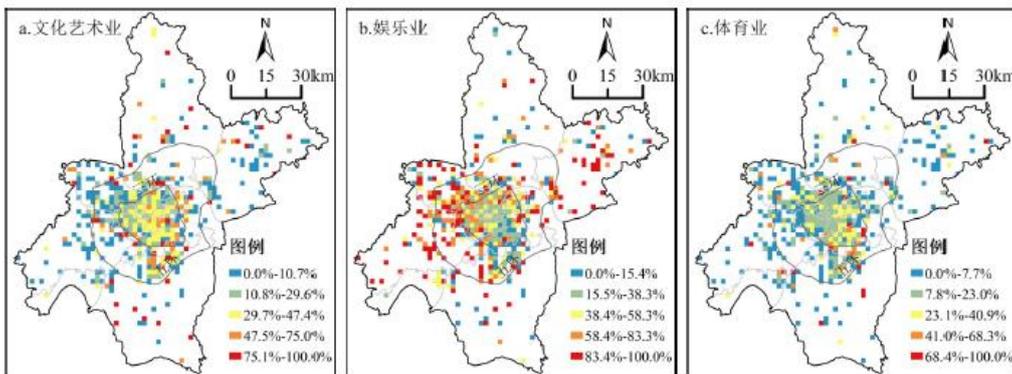


图3 基于产业分类主要文化产业的格网占比

2.4 基于吊销和注销企业反观

对吊销和注销文化企业分析可从反面透视现有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状态。通过分析发现：吊销和注销的文化企业均高度集中于三环内，但不同地区存在类型结构差异。吊销和注销的文化艺术业，占比较高的格网集中于三环内，占比较低的格网集中于三环外；吊销和注销的娱乐业则相反，占比较高的格网集中于三环外，占比较低的格网集中于三环内；吊销和注销的体育业的格网占比亦从市中心往外递减（图 4）；吊销和注销的新闻出版业、广电业与存续的新闻出版业、广电业在空间上高度一致。造

成此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娱乐业门槛较低，个体工商户较多，三环外相较于三环内，其发展环境更加多变，个体层面的资金和经验等因素也相对较弱；文化艺术业门槛相对较高，竞争较大，致使吊销和注销的企业也集中于三环内；体育业往往以体育资源或市场为导向，因此吊销和注销的企业也主要集中于资源丰富或靠近市场的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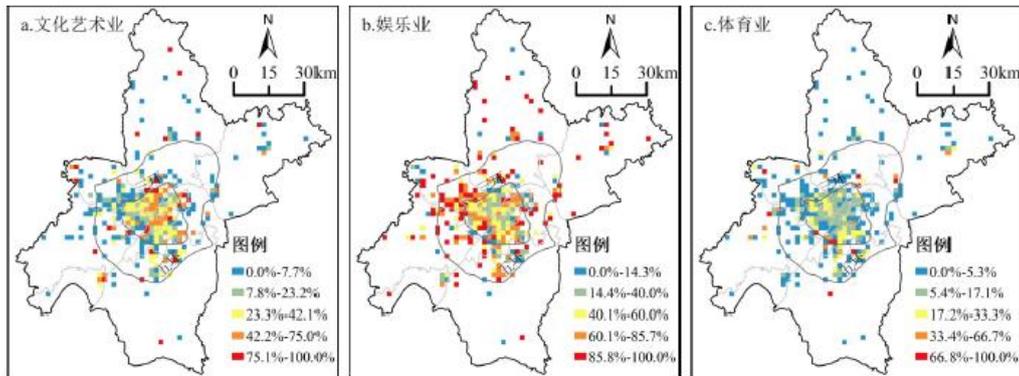


图4 吊销和注销的主要文化产业类型的格网占比

3 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模式

3.1 集聚发展中的交通依赖

文化产业对交通可达性要求较高，尤其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文化交流的人群、文化消费群体的进入均依赖便捷的交通。通过对高速公路和省道的缓冲区分析，可以发现 500m 缓冲区共覆盖 4667 家企业，占存续企业总量的 40.0%；1000m 缓冲区共覆盖 7754 家企业，占存续企业总量的 67.0%。若加上城市主干道路，这一比例高达 95.0%以上。此外，还可以发现：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人独资比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类型更具有依托交通集聚发展的倾向，新闻出版业相较于其他产业类型更具有依托交通集聚发展的倾向（图 5），这体现了不同类别的企业或产业对外部交通环境的要求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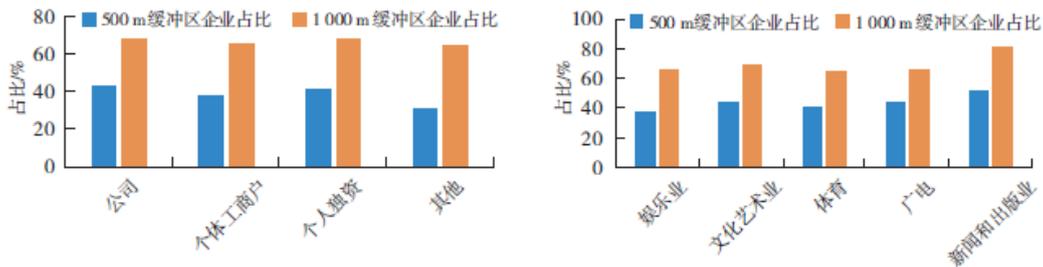


图5 主要道路缓冲区内文化企业占比

3.2 集聚发展中的区位选择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受区域环境影响尤为显著，区位选择一般可以较好地反映出此种影响。一环内文化产业类型占比由高到低分别为文化艺术业、娱乐业、体育、广电业、新闻出版业，一至二环、二至三环、三至四环、四至五环和五环外占比由高到低均依次为娱乐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广电业、新闻出版业（图 6），不难发现三环以外娱乐业在所有文化产业中一直占据绝对主体。从空间分布规律上看，文化艺术业、广电业、体育基本上距离市中心越远，数量越少，反之则越多，充分凸显了中心城区在此类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中的重要优势，即接近密集消费群体的市场优势、易于获取的各类资源/政策/服务优势、企业密切联系的协作优势等。娱乐业则呈现出相反分布规律，越远离市中心，数量越多，这主要由于娱乐业在远城区的运营成本和

面临的竞争要低于中心城区。新闻出版业集中于三环内，主要因为中心城区是各类新闻热点和教育资源的集中地，具有显著的市场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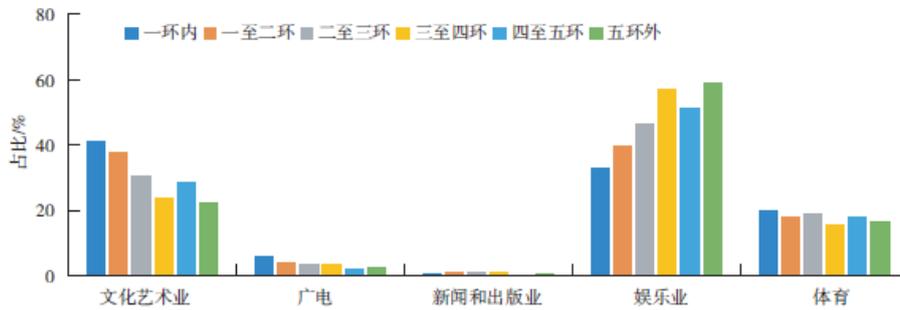


图6 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

3.3 集聚发展中的产业关联

不同文化产业类型之间如何集聚？对此通过 OD 分析（图 7），探究两两产业之间的空间关联。由于文化艺术、娱乐和体育类企业数量众多，新闻出版与广电类企业数量偏少，为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将此二类独立分析。研究发现：①87%的文化艺术类企业 500m 内覆盖着 81%娱乐类企业，平均距离 314m，在中心城区呈现出大范围的紧密联系，两类企业的服务对象有明显差异，可通过集聚实现共同发展；②76%的娱乐类企业 500m 内覆盖着 85%的体育类企业，平均距离 312m，在江岸—江汉—硤口的沿（长）江区域、青山区友谊大道沿线、武昌区徐东片区、黄鹤楼片区、中南路片区、洪山区街道口片区等商圈最为集聚，两者既相似又有显著区别，也可通过集聚实现共同发展；③85%的文化艺术类企业 500m 内覆盖着 86%的体育类企业，平均距离 297m，尤其在江岸区、江汉区、武昌区集聚程度较高；④80%新闻出版类企业 500m 内仅覆盖着 21%广电类企业，只在中南路—中北路片区、街道口片区等呈现出一定的集聚发展，说明两者在空间上集聚程度并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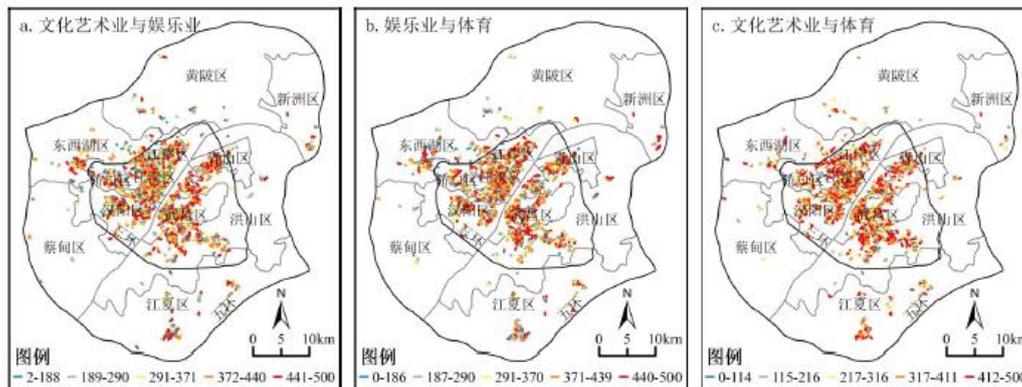


图7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间的OD分析

3.4 集聚发展中的载体依托

依托高校的集聚发展模式。武昌区、洪山区、江夏区文化产业发展普遍依托于高校，这是因为高校密集分布于这些区域，这些高校一方面为这些区域提供丰富的学术、科研、人才等资源，促使依托这些资源的文化产业不断出现，另一方面这些高校本身也是文创产业的孵化器。昙华林艺术区依托湖北美术学院大力发展艺术设计、文化传媒、教育培训等产业，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创意产业园依托华中师范大学重点发展数字类文化产业，武汉创意天地依托湖北工业大学等发展艺术创作及酒店、街区、剧场等衍生产业，东创研发设计创意园依托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湖北大学积极为周边各类创意企业提供孵化培育服务（表 2）。

表 2 文化产业园与高校之间的关系

文化产业园	毗邻高校	主要产业与功能
昙华林艺术区	湖北美术学院	创意及艺术设计类企业、文化传媒类企业、教育培训、信息咨询类企业、创新型孵化器小型企业
华师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	华中师范大学	数字内容/教育/出版、创意设计、书画艺术
武汉创意天地	湖北工业大学、首义学院	内设美术馆、艺术工作室、艺术剧场、艺术精品酒店、创意商街等功能板块
武汉华中智谷	江汉大学	数字出版、文化工业、文化创意、创新教育、展示交易、文化传媒、智能制造、商务服务
创星汇科技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科技创新创业平台的投资、建设、管理、运营
东创研发设计创意园	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湖北大学	以科技研发和创意设计为核心的创意企业孵化器
创青谷数字文化产业园	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线上视讯、动漫、游戏、VR 等数字文化领域

依托文保单位的集聚发展模式。文保单位^①（尤其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是文化企业集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文化企业集聚会形成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此种现象在三环内尤为典型。“八七”会址片、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青岛路片、一元路片、大智路片有 58 处文物保护单位，6 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昙华林片有 6 处文物保护单位、3 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 1 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昙华林艺术区）。龟山北片有 8 家文物保护单位、2 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 1 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汉阳造创意园）。

依托开发区的集聚发展模式。开发区^②也是文化及相关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依托，主要借助开发区的政策、资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武汉江岸经济开发区以出版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武汉江汉经济开发区以信息通讯、文化创意为主导，武汉硚口经济开发区近年积极引进电子商务、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势头逐渐增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 58 所高等院校和 71 个国家级科研院所，拥有光谷软件园、武汉软件新城、光谷创意产业园等文化产业的重要集聚区，拥有大批高知名度的文化龙头企业，是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的核心。

3.5 集聚发展中的主体推动

集聚发展需要特定主体推动，往往有政府主体、资本主体和社会主体等。^①政府主导的集聚发展，如昙华林艺术区，自 2005 年启动历史街区保护改造工程后，武汉市、武昌区两级政府先后修缮历史文化建筑，引进文化创意产业打造艺术村；汉阳造创意园原为百年工业遗址，2009 年汉阳区委、区政府引进上海致盛集团创建而成。^②资本主导的集聚发展，如武汉创意天地，由武汉光谷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打造，占地面积近 300 亩，以原创艺术为基础，重点发展工业设计和数字传媒产业。^③艺术家自发的集聚发展，如大李村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低廉的租金，近年来自发集聚了一大批文化创意群体；栗庙新村自 2009 年湖北美术学院新校区正式启用后，在一批批艺术毕业生的推动下自发形成文化艺术集聚中心。艺术家自发集聚发展模式一般属于非制度化发展模式，资金实力较弱，容易受到城市扩张和发展的影响，在稳定性上远不如政府和资本主导的集聚发展。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①目前武汉共有 282 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武汉市市区级 145 处，湖北省级 108 处，国家级 29 处。

^②目前武汉市共有 15 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其中 12 家省级开发区、2 家国家级开发区、1 家国家高新区。

借助文化及其相关企业数据，通过多种地理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特征及模式进行了探索，主要得到如下核心结论：

第一，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初具规模，形成了若干显著的集聚特征。①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三环内，呈现出由内向外扩散且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的态势；②个体工商户和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是远城区、中心城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③文化艺术业和体育的格网占比自市中心向城郊递减，而娱乐业则呈相反趋势，体现了城郊地区娱乐业的相对优势地位；④吊销和注销的文化企业均高度集中于三环内，但不同地区的类型结构有差异，娱乐业格网占比三环外高于三环内，其他类型产业则均三环内高于三环外。

第二，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目前在交通依赖、区位选择、产业关联、载体依托和主体推动等方面已形成特定模式。①交通方面主要表现为主要交通干道 1000m 缓冲区覆盖 95% 以上的文化企业，反映出文化产业集聚对交通可达性与便捷性的较高要求；②区位选择表现为随距市中心距离增加，文化艺术业逐渐递减，娱乐业逐渐递增，反映出不同类型文化产业集聚的区位偏好；③产业关联表现为文化艺术业、娱乐业和体育分层互补、相互促进，新闻出版业与广电业的集聚并不显著；④载体依托表现为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往往需要依托高校、文保单位、开发区等载体，借助后者的资源、服务满足自身集聚需求并降低集聚成本；⑤主体推动表现为政府和资本是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推动，社会主体相对较少。

4.2 政策启示

第一，结合武汉市文化产业目前的总体集聚发展态势，制定集聚区空间布局规划。①明确三环是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分界，因此三环内外区域的文化政策可适度有所差异，以更好地服务各自区域的文化产业集聚发展；②根据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演化方向，重点引导东西湖、江夏等区域发展，形成有特色、有竞争力、品牌性的文化产业集群；③文化产业的集聚最终是不同类型或组织形式企业的集聚，因此要清晰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中的作用，合理运用这些公司组织形式促使文化产业集聚发展。

第二，明确吊销和注销文化企业的分布规律以指导未来文化企业集聚发展，如此类企业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因何种原因吊销或注销？市场竞争原因还是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如何引导产业合理分工、有序协作？这些都是政策制定或优化的依据。

第三，根据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强化交通、区位、类型、载体、主体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中的作用。①交通方面，做好交通服务配套，营造良好的、便捷的交通环境。②区位方面，注重企业的区位选择规律，明确不同类型文化产业适宜的区域环境，进而在合适区段布局相应文化产业集群。③类型方面，注重不同类型产业内部或产业之间的配合协作，进而形成上下游、线上线下、核心边缘的分工协作关系。④载体方面，进一步挖掘和利用高校资源，进一步借助旧城改造推动闲置厂房的文化产业化利用，进一步借力开发区政策优势引导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形成。⑤主体方面，根据不同主体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优势，如政府的优势在于整体布局、政策保障，资本的优势在于资金充足、熟悉市场，社会主体的优势在于资源多样、组织自由，合理通过主体安排引导集聚发展，不能以政府或资本主导的制度化产业集聚取代非制度化的产业集聚，防止对主流之外的文化产业区一味驱逐，因为不同主体主导的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在特定时段可相互转化，如社会主导的集聚发展在成熟阶段可转变为政府或资本主导，因此要清晰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自身规律，鼓励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Zukin S. 城市文化[M]. 张廷俊, 杨东霞, 谈瀛洲,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2] Plaza B, Tironi M, Haarich S N. Bilbao's art scene and the "Guggenheim effect" revisited[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 17(11):1711-1729.

- [3]雷宏振,潘龙梅. 中国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J]. 东岳论丛, 2011, 32(8):114-117.
- [4]赵星,赵仁康,董帮应. 基于 ArcGIS 的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2):52-58.
- [5]魏和清,李颖. 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6):27-36.
- [6]熊建练,吴茜,任英华.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动态规律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6(19):84-88.
- [7]陈红霞,吴姝雅. 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区际差异比较——基于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7):25-33.
- [8]解学芳,臧志彭. “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空间分布与集群机理研究[J]. 东南学术, 2018(2):119-128, 248.
- [9]孙智君,李响. 长江经济带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5(4):49-58.
- [10]肖博华,李忠斌. 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S1):32-37.
- [11]张亨明. 皖江城市带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推进模式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8(4):109-114.
- [12]罗能生,刘思宇,刘小庆. 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1, 23(1):55-60.
- [13]梁君,陈显军. 广西文化产业集聚度实证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2(5):43-46.
- [14]喻莎莎. 河南省文化产业集聚度测算及其特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13, 21(S2):557-562.
- [15]戴钰. 湖南省文化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4):114-119.
- [16]孟召宜,渠爱雪,仇方道,等. 江苏文化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地理科学, 2016, 36(12):1850-1859.
- [17]殷小菡,曹芳洁,孙希华. 基于 POI 数据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机制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4(2):210-219.
- [18]栾峰,何瑛,张引.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园区布局规划导引策略——基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企业选址解析[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1):40-49.
- [19]薛东前,黄晶,马蓓蓓,等.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空间格局及热点区模式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 69(4):541-552.
- [20]薛东前,张志杰,郭晶,等. 西安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机制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5):92-97.
- [21]薛东前,万斯斯,马蓓蓓,等. 基于城市功能格局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研究[J]. 地理科学, 2019, 39(5):750-760.

-
- [22]杨槿, 陈雯, 袁丰. 苏州老城区文化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15, 35(12):1551-1559.
- [23]邱高会. 集聚视角下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5(6):161-165.
- [24]于杰.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研究——以济南市为例[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1):156-161.
- [25]汪毅, 徐昀, 朱喜钢. 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J]. 热带地理, 2010, 30(1):79-83, 100.
- [26]胡腊妹. 城市音乐创意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以北京平谷区“中国乐谷”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11(7):151-154.
- [27]褚劲风. 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2):170-174.
- [28]孔媛媛, 王聪聪. “媒体利器”天眼查收录全国超 1.8 亿家社会实体信息[EB/OL].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11/22/content_17808515.htm, 20200614.
- [29]王法辉. 基于 GIS 的数量方法与应用[M]. 姜世国, 滕骏华,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 [30]Zhou Z, Meng L, Tang C, et al. Visual abstraction of large scale geospatial origin-destination movement data[J].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019, 25(1):43-53.
- [31]Andrienko G, Andrienko N, Fuchs G, et al. Revealing patterns and trends of mass mobility through spatial and temporal abstraction of origin-destination movement data[J].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2017, 23(9):2120-2136.